

20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孙晨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孙 晨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著 者 孙 晨
责任编辑 吴兰萍
责任校对 岚 萍

封面设计 翁立涛
版式设计 李 萍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634-1/I·257
定 价 22.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导 论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20 世纪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如此迅猛异常的发展。

中国文学的变革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着的大门，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慢慢解体，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中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传统文化危机。于是，救亡图存、自强保种成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从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的“变易”、“更法”、“改图”等主张，到鸦片战争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派的创办军事工业，兴建民用企业，建立北洋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到维新变法派的兴民权、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裁厘金、废漕运、废科举、兴学堂；从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张“民主”、“科学”大旗，“打倒孔家店”。中国社会因应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西方文化的撞击以及国内的动乱局势，不得不先后进行着物质文化的变革、制度文化的变革、精神文化的变革。

文学被融入这些变革之中，一些变革者也自然而然地用文学作为启蒙民众、改革社会、救亡图存的工具。1902 年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的重要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众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

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显然，梁启超将小说（也包括一切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联，使之成为改良群治，“新民”的工具。

同样，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文学组织——南社也是用文学来宣传民族革命的。高旭要用文学“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醒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①被称为“南社灵魂”的柳亚子则将自己的诗歌称作“大刀标枪”，“是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②

甚至林纾翻译外国小说也是要“寓其改革社会，激动人心之雅志”。^③而严复翻译《天演论》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④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事实上，20 世纪初期很多倡导文学革新的人，并非单纯的文学家，他们之中很多人主要是政治家或社会的改革者。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压倒对文学的热情，对政治的兴趣往往超过对文学的兴趣。梁启超说得很清楚：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吾喜摇笔弄舌，有所议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厘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⑤

诗界革命的重要诗人黄遵宪也将诗歌视为“余事”，而且从内心讲，他“不忍为诗人”。既然如此，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就是十分自然的事，而文学的功利观也必然是这些政治型文学家的自觉选择。

当然，在那个时代并非没有纯文学的提倡者，王国维就是一个代表。王国维“独谓中国无纯文学，中国文学无悲剧，辟奇论以砭往古，树新义而诏后生。”^⑥但王国维的不合时宜的主张，在

当时难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正如钱基博所说：“徒以议多违俗，物论骇之；寻遭禁绝，不行于世。”^⑦

总之，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政治的语境中拉开序幕的，这使它从一开始就承载了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的风云，充当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武器，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宣传性。中国文学的这个特性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起伏而起伏。但问题是，在近半个世纪内，中国社会一直没有走出内忧外患的阴影，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因此，中国文学的政治话语也一直没有改变，功利性、宣传性一直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使是反对“文以载道”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没有逸出这个历史的规约。就文学革命的几位重要倡导者来说，他们都不是离开时代、社会、政治、人生去空谈文学问题的。他们反对的是载封建孔孟之道的旧文学，提倡的是载新思想之道，载“民生”、“科学”之道的新文学。换言之，他们绝不是“纯文学”、“超功利文学”论者。陈独秀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的兴趣主要在政治。他提倡文学革命的目的主要是将其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社会的利器。胡适对文学的形式问题谈得较多，但这仅只是将形式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以创造一种能够很好地表现“新内容和新精神”的新文学。同时，他又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⑧有趣的是，胡适的这后一个观点曾被他的好友、文学革命的激烈反对者梅光迪讥刺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偷得 Tolstai（托尔斯泰）之绪余”，“此等 19 世纪之旧说，久为今人所弃置。”^⑨梅光迪将胡适视为“功利主义”，看来是一种误解。其实，胡适对文学的理解是较为宽泛的。他将文学分为两种：一是有所为而为之者；一是无所为而为之者。前者是“根柢济用”的

文学，也就是功利主义的文学。后者则是言情的文学，也就是纯文学。胡适认为两种文学各有其价值：“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⑩不过，胡适同样重视文学的“济用”性（也就是功利性），绝非梅光迪那样的“纯文学”论者，则是确定无疑的。

在“五四”时期，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也担当着反封建的任务，即在文学战线上向封建专制制度，封建思想意识，吃人的旧礼教、旧道德发起攻击。因此，关注社会、人生，在社会变革中起到客观效用，一直是新文学追求的重要目标。无论是鲁迅的“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文学主张，还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抑或是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纲领，都充满了对“人”，首先是下层社会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关注和同情，都是有所为而为之的，都十分重视文学的客观效用和认识价值。

创造社也许是个例外：他们提倡过文学的无目的论，被视为“为艺术而艺术”派。但如果真的以为创造社要远离时代和人生，远离对旧社会的反抗和斗争，那又大错而特错了。正如胡风所说：

当时的“为人生的艺术”派和“为艺术的艺术”派虽然表现出来的是对立的形势，但实际上却不过是同一根源底两个方向。前者是，觉醒了的人把他的眼睛投向社会，想从现实的认识里面寻求改革底道路；后者是，觉醒了的人用他的热情膨胀了自己，想从自我底扩展里面叫出改革底愿望。^⑪

但是，也应当看到：“五四”新文学与清末民初的文学是有区别的。用一句并不十分贴切的话来说，前者是政治家谈文学；后者是文学家谈政治。政治家谈文学，立足点主要在政治上。因此，他们所谈的文学自然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是作为工具

和武器的文学。文学家谈政治，立足点主要在文学上，他们所谈的政治则较为宽泛，不仅有现实的政治问题，也有一般的社会问题，更有对“人”的思考，对人生的探寻。一般说来，政治家谈文学，文学往往缺少主体性，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也较少审美价值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文学家谈政治，则往往表现出书生意气，比如有的问题小说甚至“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但文学却有自主性。所以，“五四”新文学的成就远远大于清末民初文学。

3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在严酷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面前，似乎走上一条更加政治化的道路。创造社的一些作家在20年代末期很快转向提倡革命文学，李初梨认为：“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者。他不是在看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他的‘艺术的武器’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所以我们的作品，不是像甘人君所说的：是什么血，什么泪，而是机关枪、迫击炮。”^⑫麦克昂（郭沫若）也说：“文艺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⑬显然，这是一种更鲜明、更激进的文学武器论和文学功利观。

20年代末期，鲁迅也赞同革命文学，尽管在对革命文学的一些具体看法上，他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人有分歧，但他同样说过：“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⑭他还说过：“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⑮不同的是：鲁迅首先力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他同时认为“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⑯

1930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左翼文学在政治话语中的新发展。左联一成立就明确宣告：“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术，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便向

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呼喊它的明耀的光芒。……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⑩1931年左联的决议中又提出六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重要的当前任务”，这六项任务件件都与革命斗争、与政治密切相关。中国文学的工具性、功利性无疑大大加强了。

抗战时期更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是全民族起来共同抵抗日寇侵略的时期。文学自然要纳入这项空前残酷，也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充当时代的号角，成为“全民族救国运动中的一环”，“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郭沫若对文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文学家必须“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⑪抗战之初，臧克家用诗歌表达了文学家们的共同心声：

诗人啊！

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摘自《我们要抗战》

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十分重视文学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进一步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的讲话带着纲领性质，不仅成为解放区文学的指导方针，也成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中的不容怀疑、不容摇撼的指导思想。

于是，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救亡图存中，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政治家们的热情宣传中，扮演了一个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与战斗者的角色。这是情有可原的，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必然命运。中国文学无法逃避这个必然的命运，文学家也必然要尽自己的职责。自然，这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骄傲。鲁迅在论到小品文时说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⑩

确实，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被当作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具有鲜明的功利性，是有着必然的时代原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

中国文学的功利性、实用性，恐怕还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思想有关。孔子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重视；墨子的“尚用”、“尚质”的文学思想；乃至《大学》（《礼记》中的一篇）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士大夫阶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以及后世特别是明末东林党人及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构成了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历代的一些文人也十分重视文学的致用性、功利性及认识作用。曹丕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要借文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们所看重的正是文学的功利性、实用性。韩愈提出“文以载道”说，后世宋代理学的发挥，更使文学的功利观、工具观成为封建正统文学一个牢不可破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埋藏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自然影响着 20 世纪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

文学应该有马克思早在 1842 年《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所要求的：“风格的多样化，充分的艺术民主，以及作家的‘主体的权利’”。但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政治却不时对文化进行着粗暴的干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创

新和发展。当然，建国后 17 年的文学并非没有成就，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优秀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片面的强调文学为具体的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服务，为具体的即时的方针政策服务的倾向，毕竟愈演愈烈。文学终于被“四人帮”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死胡同。

80 年代以来，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中国文学开始全面复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新潮小说、新写实派文学，以及朦胧诗、先锋派、“实验”、“第三代”、“第四代”、“城市诗”等等，纷至沓来。20 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文学呈现了多姿多态，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论到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时说：“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对于 20 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来说，一旦挣脱了政治加在它头上的桎梏，便会像开了闸的江流，呼啸而出，奔腾而下。文学开始向着自身回归，文学的“生产力”表现出难以遏止的势头。但大江东去，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里，我们也看到了迷惘和困惑。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引进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冲击，更是繁杂紊乱。例如有人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消解理想和崇高，消解雅俗，反“主流政治”、反“主流意识形态”，反对文艺表现什么，只关心如何表现等等。

事情似乎又回到了原点：20 世纪初改革者们引进西方先进思潮尽管也有些杂乱，但却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为了救亡图存。今天我们盲目引进西方现代思潮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还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是为了作者对社会应尽的职责，还是为了单纯的自我张扬？早在 20 世纪之初，鲁迅就批评过一些“抱枝拾叶”，盲目效法西方的“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

垂微饵以冀鲸鲵。”^{②0}当然，我这里并非将提倡后现代主义的人比作清末倡“金铁国会立宪”之说者，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文化心理上，在思想方法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而借西方思潮（有的思潮在西方也已是“迁流偏至之物”）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文学的社会责任，则又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话题了。因此，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文学与政治的话语又悄然摆到面前。固然，像过去一度出现过的那样：政治粗暴地干涉文学，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遭人痛恨，遭人厌弃；但文学全然脱离社会，脱离人生，或者以文学代替政治，取消政治，又将如何呢？我们所能看到的结果起码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文学只成了作家自己或一个小圈子中的事，与广大群众无涉，当然也得不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和欢迎。于是，有人又创作出媚俗的文学，以浅薄、庸俗，乃至下流、低级趣味去取悦一些读者。这也许算是有商品意识，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作家改造社会的责任何在？作家的良知、良心何在？如果为了钱而不顾一切，那么这样的作家与利欲熏心的商人和贪官还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作家也确实只能称作“码字儿”的了。

看来文学全然脱离政治与文学全然依附政治，同样是可悲的。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的“文学和政治关系密切，但不从属于政治”；^{②1}20世纪末江泽民提出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当在现代化的征程中，走出一条健康的中国之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应当带着它的熠熠光辉，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注释:

- ①高旭:《愿无尽庐诗话》。
- ②《柳亚子的诗与字》。
- ③陈熙绩:《歇洛克奇案开场叙》。
- ④严复:《译〈天演论〉自序》。
- ⑤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 ⑥⑦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 ⑧⑨胡适:《观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胡适散文》第3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 ⑩胡适:《论“文学”》,(《胡适散文》第3集,第247页)。
- ⑪胡风:《文学上的五四》,(《胡风评论集》第122页)。
- ⑫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42页)。
- ⑬麦克昂:《桌子的跳舞》,(《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第106页)。
- ⑭⑮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2—84页)。
- ⑯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6页)。
- 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186页)。
- ⑱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收《沸羹集》)。
- ⑲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577页)。
- ⑳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 ㉑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编 清末民初文学初探	
清末文学革新运动新论	(2)
论“诗界革命”中的黄遵宪	(17)
迷茫和困惑中的跋涉	
——论苏曼殊的小说创作	(29)
第二编 中国现代文学概论	
论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继承与创新	(44)
再论胡适的形式革命	(60)
论瞿秋白的文腔革命	(76)
现实主义诗歌综论	(86)
论创造诗派	(111)
论臧克家的长篇叙事诗	(134)
一串闪光的星辰——吴奔星和他的诗	(185)
瀛谈百代传邹子——论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及 《萍踪忆语》	(194)
第三编 鲁迅研究	
鲁迅与安特列夫	(208)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	(241)
鲁迅与翻译	(257)
新时期台港与海外鲁迅研究述评	(273)
从“立人”到“无产阶级解放斗争”	
——鲁迅的人权观论析	(288)

	以今例古——从鲁迅的《故事新编》看历史题材 文学作品的创作·····	(297)
	20 世纪鲁迅比较研究的检阅 ——评《鲁迅世界性的探寻》·····	(304)
第四编	中国当代文学点击	
	巴金访问记·····	(312)
	心底蕴藏着一个奔腾的大海 ——论回族诗人木斧及其诗歌创作·····	(318)
	好一朵茉莉花——论军旅诗人纪鹏的 《茉莉花集》·····	(326)
	黄土高坡的歌声——论西北作家马步升的 《一个人的边界》·····	(331)
第五编	学海拾贝	
	寂寞诗坛的呐喊 ——评吴奔星《中国现代诗人论》·····	(338)
	风格流派研究的新开拓 ——评吴奔星《风格流派论》·····	(346)
	耕耘在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的园地中 ——吴功正论·····	(349)
	向沫若史剧研究的纵深处拓展 ——评吴功正《沫若史剧论》·····	(360)
	众里寻他千百度 ——论李丕显及其《寻美探幽》·····	(367)
后 记	·····	(379)

第一编

清末民初文学初探

清末文学革新运动新论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显示了中国文学实行变革的趋势。

揭开变革序幕的是清末文学革新运动，这个运动开始于戊戌维新变法前后。它以自己的成就和得失、经验及教训，给“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气候和土壤。

—

清末文学革新运动的发生与旧文学的没落有关。19 世纪末期中国封建正统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穷途末路，这是旧文学墨守陈规的保守性必须带来的结果。梁启超曾经说过一段值得人们深思的话：

我国以开化最古闻于天下，当三千年前欧西赫赫榛榛之顷，而我之文明文物已足与彼之中世纪相埒。由于自满自惰墨守旧习，至今阅三千余年而所谓家族之组织、国家之组织、村落之组织、社会之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现象仍岿然与三千年前无以异。^①

梁启超的这段话说得未免过分，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情况未必完全吻合。但它确实触及了问题的要害。盲目尊古、盲目拟古一直是文坛上的一种风气。以中近代而论，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清代桐城派标榜孔、孟、程、朱的“道统”，韩、柳、苏、欧和归有光的“文统”；以及 19 世纪中期以